

中东研究缘何错失阿拉伯之春^{*}

[美] F. 格里高利·高斯三世 著 闫伟译

美国佛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中东问题专家格里高利·高斯三世(F. Gregory Gause III)在美刊《外交事务》2011年第4期以《中东研究缘何错失阿拉伯之春:威权主义稳定性的神话》为题撰文指出,美国学者夸大了阿拉伯威权主义政权的稳定性。作者认为,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政权与军队不只是同盟的关系,后者在一定情况下会成为前者的异己力量;经济自由化改革所产生的贫困、分化、腐败,以及中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共同削弱了阿拉伯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阿拉伯民族认同并未衰落,反而成为阿拉伯世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主要原因。这些新观点对于反思政治发展理论、分析“阿拉伯之春”的走向具有一定的意义。

2010年末,两位中东国家领导人的下台,以及如今威胁到阿拉伯统治者的巨变,使大多数研究阿拉伯世界的学者感到震惊。阿拉伯国家的政权显然不受欢迎,而且面临着人口、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压力。然而,许多学者热衷于解释他们所认为的阿拉伯政治中有趣而反常的现象,即非民主政权的延续性。

直到如今,阿拉伯世界仍然有许多这样的统治者。在民主化浪潮席卷东亚、南欧、

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数十年间,这些政权却生存下来。甚至在中东非阿拉伯的伊斯兰国家中,也经历着显著的政治变革。伊朗爆发了革命,并在其后30年进行了政治变革;在世俗的土耳其,准伊斯兰政党建构了一个更加开放和民主的政治体系。在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阿拉伯国家却能保持长期的政治稳定。研究中东的学者应当对此加以关注,并作出解释。

阿拉伯国家及其军队

几乎没有政治学家从文化的视角阐释中东阿拉伯政权独特的稳定性。在那些探讨阿拉伯统治者如何延续其统治的文献中,并未包含伊斯兰如何与民主为敌,或者为何阿拉伯文化中所含有的家长制和传统因素不能支持民主变革。我们承认民主的概念在阿拉伯世界非常流行,当阿拉伯人被赋予真正的选举权时,很多人会去投票。我们也明白阿拉伯人不会被动地接受威权主义统治。但是,在2011年前,这些政府成功压制了人民。

因此,学者们关注于阐释阿拉伯国家所建构的、用以压制民众不满的制度。尽管不同的学者关注点不尽相同,如从国内的制度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东热点问题与联合国研究”(批准号:12JJD810009)的阶段性成果。

到政府的战略，但是，大多数学者都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稳定归结为两个方面：军事—安全复合体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学术界认为这两个方面在将来还适用。但是，2011年的事件证明这一观点并不正确。

大多数学者认为政权、军队以及安全部门是一体的。这种观点并不合理。包括本·阿里和穆巴拉克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国家总统，在上台之前都在军队任职。在20世纪50、60年代阿拉伯国家发生军事政变后，其领导人创制了一些机构从政治上对军队进行控制。阿拉伯军队帮助政府赢得内战，镇压暴动。因此，大多数学者开始认为，阿拉伯的军队和安全部门永远不会与统治者决裂。

这种观点明显并不正确，学者们未能预测和解释当今阿拉伯军队对于大规模和平抗议的态度的变化。发生这种疏漏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大多数学者失去了对阿拉伯政治中军队作用的研究兴趣。尽管在50、60年代，对阿拉伯军事政变的研究充斥着当时美国的学术界，但是此后，阿拉伯国家异常的稳定使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已不再重要。然而，通过对群众运动的初步分析，可以发现阿拉伯军队对于前者的态度取决于两个因素：政权和军队的社会构成，以及军队本身的制度化和职业化水平。

埃及和突尼斯是中东最具同质性的国家，绝大多数民众属于逊尼派。这两个国家的军队相对专业，非但不是统治者个人的工具，而且作为独立的机构支持抗议者。同时，两国军队的将领也意识到军队在新政权中可能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因此甘愿冒险放弃旧角色。在那些军队制度化程度低的阿拉伯国家，安全部门为统治者及其家族掌控，并成为其工具。在民众抗议面前，这些军队分崩离析。在利比亚和也门，统治者家族领导的那部分军队支持政权，部分军队则倒戈反对现政权，也有部分军队保持中立。

在什叶派占多数的巴林，逊尼派掌握着安全部队，因此军队反对示威者，维护逊尼

派国王的统治。尽管在约旦占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引发动乱，但是军队仍然忠于国王。之所以如此，原因非常简单：在这些国家，如果现政权倒台而多数派掌权，很可能会替换原来的军事将领。

当阿萨德政权面临危机时，叙利亚军队的反应可以有效地印证这一观点。在一个逊尼派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阿萨德家族却掌控着军队中的重要部门，军队中的大部分将领由阿拉维派和其他少数民族出任。如果少数民族仍然支持现政权，那么阿萨德很可能继续掌权。然而，如果军官感到不满，认为军队成了阿萨德家族的工具，那么他们可能会推翻现政权。无论如何，一旦政局趋于稳定，研究中东的学者们就需要重新审视阿拉伯国家与军队的关系。这或许是当阿拉伯政权面临危机时决定其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

改革因素

有学者认为中东国家政权稳定的另一个支柱就是国家控制经济。他们认为那些拥有石油资源和石油收入的国家，运用石油财富控制经济，建立救助系统，提供社会服务，指导依附于国家的私人企业的发展。通过分配石油财富，阿拉伯国家将重要的利益集团与统治者的存亡联系起来，并且在发生危机时救济平民。事实上，当最近阿拉伯国家面临危机时，在主要的石油输出国中，只有利比亚面临严峻的挑战。由于高油价，其他石油输出国可以通过增加工资、提高对消费品的补助、提供新的工作岗位以及直接向民众发放补贴等手段分配财富，从而压制对政权的潜在威胁。卡扎菲的例子说明，石油收入的分配必须妥当，才能维护统治，而不是将其浪费在随意的工程和摊子铺得过大的项目上。近来阿拉伯国家政局的动荡似乎印证了这些学者关于阿拉伯政治稳定的论断。

然而，当阿拉伯国家的动荡波及非产油国时，政权的稳定性具有经济基础这一论断

便出现了问题。尽管在世界经济中阿拉伯产油国由于拥有石油收入而未进行经济改革,但在过去的20年中,外国在援助阿拉伯国家时要求其进行自由化改革,这些国家被迫进行了经济现代化。包括埃及、约旦、摩洛哥和突尼斯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开始将国有企业私有化、鼓励外国投资、激励私人企业的创办、削减补助和国家预算的开支。这种“华盛顿共识”式的经济改革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使穷人维持生计更加困难。然而,这些阿拉伯国家仍然为某些企业家创造了机会,并且通过贸易自由化改革使社会上层拥有了更多的消费选择。一些学者认为,经济自由化可能会催生支持阿拉伯威权主义的新的基础,并且会使经济增长超越人口增长。与此同时,西方政府也大力宣传这样一种观念,即经济改革有助于推进政治改革。

对于这些阿拉伯国家来说,经济改革却事与愿违,这一点在埃及和突尼斯体现得极为明显。尽管两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不错,但是两国政府对私有化的推动未能增强政治稳定性,相反却造就了一个非常富有的企业家阶层,总统的家族成员也包含其中。这便是民众愤怒的原因。因此,那些认为经济改革会使其受益者支持威权主义统治的观点并不正确。那些国家滋养的企业家或是出逃,或是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中产阶级上层也不支持本·阿里或穆巴拉克。事实上,一些人还成为革命的领导者。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埃及局势的动荡是由一位曾担任过谷歌高管的埃及人瓦伊尔·郝尼姆(Wael Ghonim)引发的。郝尼姆受益于穆巴拉克在埃及推行的双语教育,毕业于开罗的美国大学,从事国际商贸。然而,他甘冒丧失前程和生命的风险,在“脸谱”网站上创建了名为“我们都是卡尔德·萨义德”的网页,以怀念被警察打死的萨义德。对于郝尼姆以及其他具有相似经济地位的人来说,政治自由要超过经济上的机遇。

其他的阿拉伯领导人在注意到埃及和突

尼斯的状况后,马上采取措施提高薪金、取消削减补贴的计划、增加就业。例如,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宣布了一项总额为1000亿美元的补贴计划。沙特拥有石油收入,因此可以实现这些承诺。在非产油国,政府没有资金维持原有的社会基本保障,以换取民众对政府的忠诚。如约旦,因而不得不放缓了经济改革的步伐。埃及和突尼斯新政府也确认了两国在经济问题上的承诺。然而,两国政府并没有资金恢复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兑现选民所要求的收入分配方案。

许多学者承认,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会引发阿拉伯国家的政治问题。但却没预见到这些国家由此引发的政局动荡。这些学者高估了阿拉伯国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以及改革受益者的政治影响。他们也低估了人们对于改革所产生的腐败和私有化的愤怒程度。石油财富仍然是确保政治稳定的有力工具,至少高油价时如此。然而,学者们关注阿拉伯国家如何使用石油财富确保政治稳定的同时,却忽视了不成熟的经济自由化政策所带来的不稳定效应。

新泛阿拉伯主义

研究中东的学者所忽略的另一个因素是:对国家的政策和制度的研究少于对阿拉伯的跨界认同的研究。在阿拉伯世界,政治巨变的同时发生并非巧合。2009年,伊朗爆发“绿色运动”后,阿拉伯的活动家和知识分子也受到影响,但却没有像伊朗人那样走上街头。然而,2011年,突尼斯发生水果小贩自焚事件后,阿拉伯世界却充满了动荡。尽管阿拉伯人生活在20多个国家,但仍然保持着共同的政治认同。

学术界不应对这种强烈的泛阿拉伯情感感到惊讶。先前,学者们关于阿拉伯政治的许多研究成果集中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以及阿拉伯领导人获得周边阿拉伯国家支持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基于一种信

念,即所有阿拉伯人拥有共同的政治认同和使命。然而随着 1967 年阿拉伯国家被以色列击败,许多学者认为阿拉伯的跨界认同感变弱了。埃及和约旦与以色列签订条约,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与以色列进行谈判,共同打碎了泛阿拉伯主义的核心禁忌。1990—1991 年,以及 2003 年初,在美国领导的针对伊拉克的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并未因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而削弱其政治稳定性。这便是阿拉伯政府可以抵御大众情感以及泛阿拉伯主义脱色的标志。阿拉伯国家看起来已足够强大,能够抵御跨界认同的压力。大多数学者认为泛阿拉伯主义已销声匿迹。

因此,他们错失了 2011 年的这股浪潮。尽管近期发生的事情说明阿拉伯认同仍然重要,但从形式上看,已与半个世纪前埃及总统纳赛尔领导的泛阿拉伯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作为一位具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纳赛尔和其强大的政府运用当时的新技术,如收音机,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宣传阿拉伯认同,要求阿拉伯人与其一道反对他们的政府。而如今,埃及和突尼斯两国政府极弱的领导能力,反而成为激励整个阿拉伯世界之源。

最近几十年,一些阿拉伯领导人试图继承纳赛尔的思想,领导泛阿拉伯主义运动。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海湾战争时期的萨达姆。甚至伊朗领导人霍梅尼也试图借助伊斯兰教将阿拉伯人召入自己的旗下。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然而,当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众推翻他们腐朽的统治者时,其他的阿拉伯人认同他们的行为。这两国的群众运动推翻了统治者,也给予其他阿拉伯人以希望,即他们也可以如此。2011 年,阿拉伯人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美国或以色列,而是阿拉伯的统治者。

学术界需要对阿拉伯认同进行重新评价,以便于理解中东政治发展的前景。与先前的泛阿拉伯主义不同,这股新的浪潮并未挑战中东地区的版图,阿拉伯人也未表现出希望将他们各自的国家统一为一个阿拉伯实体的愿望。他们的目标只是民主。但是,阿

拉伯的局势动荡体现了,在一个阿拉伯国家发生的事件会强烈地影响到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因此,学者们进行研究时,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单独的事件。对于美国来说,支持埃及这样的阿拉伯国家进行民主化,同时却要压制如巴林这样的国家的和平的民主抗议运动,无疑非常棘手。

此外,新泛阿拉伯主义最终将使阿以和平进程退步。尽管在 2011 年阿拉伯国家的政局动荡不是因巴勒斯坦而起,但在对待以色列的问题上,阿拉伯的民主政权势必反映民众的态度,这令人堪忧。以巴冲突,以及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行动,直接影响着阿拉伯民众对美国的态度。因此,美国需要重启以巴和谈,以满足中东阿拉伯人的要求。

结 论

对阿拉伯威权主义的稳定性的阐释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不过,这也导致一些学者低估了阿拉伯政治中的深层变化。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精确地预测阿拉伯世界的发展前景是不可能的,也不是我们的目标。学者们必须再次审视一些结论,如阿拉伯政治中军队的影响,经济的变化对于政治稳定的影响,以及阿拉伯跨界认同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把握阿拉伯政治发展的全景。

阿拉伯局势的动荡,使原有的政治发展理论受到挑战,一些例证也失去了价值。阿拉伯局势的动荡不是美国或其他国家外交政策的结果,而是产生于阿拉伯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之中,这一点极难预见。阿拉伯人将以他们自己的能力去塑造他们的未来。这最好留给阿拉伯人自己去解决。■

[闫 伟: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责任编辑 吴 迎)